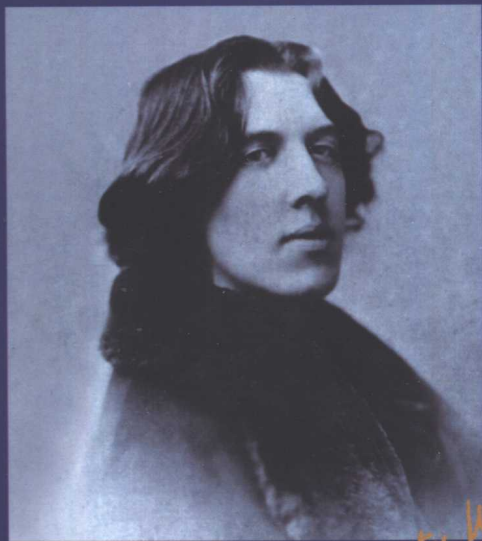


# 王尔德全集



*Oscar Wilde  
Oscar Wilde  
Oscar Wil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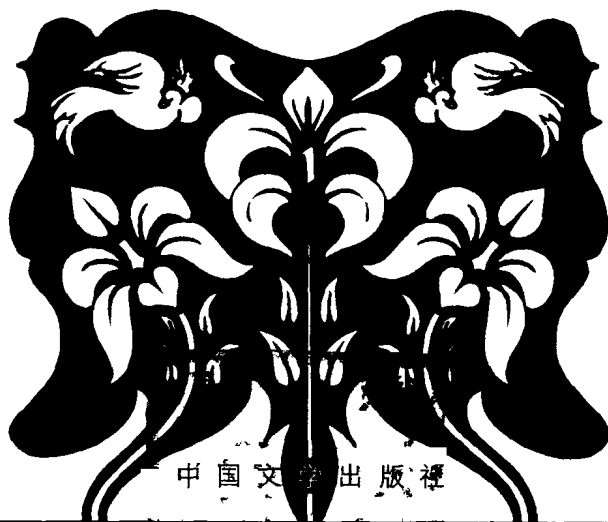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出版社



# 王尔德全集

小说童话卷

荣如德 巴 金等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尔德全集 / (英) 王尔德 (Wilde, O.) 著; 赵武平主编 .  
-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9  
ISBN 7-5071-0445-1

I. 王… II. ①王… ②赵…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英国  
- 近代 IV. I56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8) 第 00144 号

责任编辑: 文 钊 季晟康 邓锦辉  
装帧设计: 宁成春

## 王尔德全集

(英) 奥斯卡·王尔德著

赵武平主编 荣如德、巴金等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 100037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电话: 68320635)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数: 2700 千 印张: 108.5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5071-0445-1/1·396

定价 (共六卷): 198.00 元

# 中文版序

陆建德

这些人被称作雅士，不相信派，漂亮哥儿，花花公子或浪荡子，他们同出一源，都具有一种故意作对和造反的特点，都代表着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有的那种反对和清除平庸的需要。

波德莱尔《浪荡子》<sup>①</sup>

—

英国十九世纪末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曾说悖论之道乃真理之道。王尔德本人的艺术信条和生活实践为这条箴言作出雄辩的例证：他一次次声明艺术应该远离当代社会和日常生活，但是我们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来谈论他的文学创作。

王尔德作品里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勋爵”的形象，他自己却不是出自名门望族，不过他的家庭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算得上是

---

<sup>①</sup>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1987），第501页。

非常体面的。父亲是都柏林遐迩闻名的眼耳科医生，在包括爱尔兰文化与习俗在内的学术领域也有所建树，王尔德十岁那年（1864）他因人口统计上的贡献被维多利亚女王册封为爵士。母亲是颇有抱负的诗人、翻译家，一度热心爱尔兰民族运动，提携过像萧伯纳、叶芝这样的年轻作家。王尔德在母亲的文学沙龙里耳濡目染，自幼喜爱古典文化。他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就读时因希腊文成绩优秀得伯克利金质奖章，一生以此自豪。三一学院古代史教授约翰·马哈菲对他的影响不能低估。王尔德曾说马哈菲“有意识地从艺术的立场看待一切，而这也在成为我的立场”。他还细读马哈菲《希腊社会生活：从荷马到米南德》一书书稿，书中提及古希腊男性间非同寻常的情谊，这在当时是有点犯忌的话题。王尔德在三一学院攻读三年后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牛津的两位杰出人物不可不提：沃尔特·佩特和约翰·罗斯金。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在王尔德进牛津前一年即1873年出版，王尔德将这部著作称为“美的圣经”。佩特在该书结论中写道，人们应当培植敏锐的感觉来捕捉生活和艺术中无数光亮的瞬间，从而使轻快生动的“宝石般的火焰一直燃烧”；能保持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就是人生莫大的成功。罗斯金早在四五十年代就以五卷本的《现代画家》、三卷本的《威尼斯之石》和《建筑的七盏灯》等书独步英国艺术批评界，后来又以对工业资本主义、以穆勒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猛烈抨击著称于世。罗斯金于1870年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斯雷德艺术教授，他在授课时特别强调美和劳动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以及艺术的教化作用。王尔德曾与其他牛津学生一起参加一项由罗斯金发起的筑路工程，这对于四体不勤的王尔德而言确实是相当难得的。

1878年，王尔德以考试优等的资格从牛津毕业。他自称“美学教授、艺术批评家”，并说，“我总是要出名的，没有美名

也有恶名”。大英帝国的核心伦敦是这位爱尔兰青年意欲征服的对象。矛盾的是，要征服伦敦必须首先为伦敦上流社会的价值观所征服。王尔德衣着考究入时，举止温文得体，说起话来妙语连珠，那带有拖腔的牛津口音十分地道，慵惰中透出高傲。伦敦的社交圈子很快就把这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奉为上宾。王尔德不仅有冷隽幽默的谈吐，偶尔还显露出舞台表演的才能。1879年法国名演员萨拉·贝纳尔访英，前往轮船码头迎候的王尔德把一大抱百合花撒落在她的脚下。他当时与莉莉·兰特里和埃伦·特里等女演员的交情为他九十年代在戏剧界异军突起埋下伏笔。1880年，王尔德和画家朋友弗兰克·迈尔斯从索尔兹伯里街13号的泰晤士堂搬到泰特街一处华宅，并把名家布置设计的寓所取名济慈堂，唯美主义在当时的伦敦已经有了点名气。济慈曾写过“美的东西是永恒的快乐”（《恩狄米昂》）和“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希腊古瓮颂》）这样的诗句，他被当作唯美派的先锋也是在情理之中。济慈堂很快成了名流佳丽云集的地方，王尔德的社交地位也日益巩固。他拜访过迪斯累里、格莱斯顿等首相级的政要，自己也成了拜访的对象。当时的威尔士亲王说过，“我还不认识王尔德先生，不认识王尔德先生就是素不为人们所知。”

济慈堂的客人为泰特街增添一道风景，不过泰特街也因著名画家詹姆斯·惠斯勒（1834—1903）闻名。出生于美国的惠斯勒50年代在巴黎求学时生活豪放不羁，他聪明浪荡，与拉斐尔前派画家关系密切，堪称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中坚人物。佩特历来洁身自好，满足于牛津大学里修道院般的生活。像他那样的学究，不会结党连群，更不会以四处树敌来制造声势。在英国，真正宣扬法国诗人戈蒂耶在小说《模斑小姐》序言（1835）中提出的“为艺术的艺术”理论的是善于吸引媒体注意的惠斯勒。

美必然而且必须与道德原则相一致，这是罗斯金的一贯主

张。他坚持不能为了美牺牲真理和道德目的，正是出于这一立场他对拉斐尔前派的绘画由支持转向批评。而惠斯勒则认为，美或艺术与道德无关。罗斯金在 1877 年指出，惠斯勒抛出这样的艺术观无异于往公众脸上扔了一罐子颜料。想不到惠斯勒为此状告罗斯金，最终赢得四分之一便士的赔偿，但巨额的诉讼费用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王尔德在初到伦敦的几年里与惠斯勒过从甚密，惠斯勒对他的影响绝对不在佩特和罗斯金之下。可以说，正是惠斯勒使当时的英国唯美主义多了一层法国式颓放任诞、玩世不恭的色调。

泰特街上的唯美主义者还喜欢在装束上与众不同。王尔德在牛津时就偏爱稍稍出格的打扮，如今到了伦敦，他在时髦的大街上倘佯自得，上装翻领钮孔上插的葵花或百合粲然可观。身高近一米九（六英尺三英寸）的王尔德在大庭广众之中刻意求美，自然招来很多好奇乃至鄙视的目光。有人把这类矫揉造作的举动视为投机取巧。有意反抗庸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唯美派为数不少，但是没人能像王尔德那样幸运地成为唯美主义运动的活标本。其他艺术家以创作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王尔德则有为自己做广告之嫌。“你毕竟不可能在脖子上挂一张新潮画派的作品，而致力于时装改革者却是自己知名度的经纪人。很多艺术家在自己的领域作出成绩，而王尔德则是在公众面前抢了他们的镜头。”<sup>①</sup>

但是，自古以来一直有人以服饰来表明自己格高意远。譬如屈原在《涉江》中写道：“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波德莱尔对此有一番别出心裁的解释。在本文篇首引用的《浪荡子》一文里，波德莱尔担心十九世纪欧洲的民主浪潮会荡平一切，因而把穿着打扮别具一格的

---

<sup>①</sup> Hesketh Pearson, *The Life of Oscar Wilde* (New York, 1946), p. 39.

浪荡风度当作“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精神的贵族式优越的一种象征”。从王尔德后来的书信来看，他确是有意识地在生活中扮演类似布伦梅尔（1778—1840）那样的优雅浪荡子的角色。波德莱尔还指出，浪荡子身上的冷漠神气是他的美的特色，“它来自决不受感动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可以说这是一股让人猜得出的潜在的火，它不能也不愿放射出光芒”。纽约摄影师萨洛尼在1882年2月为王尔德拍摄的半身侧面像<sup>①</sup>是那种冷漠神气的最佳示范。

一心追求服饰之美的王尔德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取得了在《笨拙》杂志上被漫画家杜穆里埃作画讽刺的资格。先后于1880年11月和1881年2月在伦敦上演的戏剧《猫在哪儿？》和《上校》也取笑了泰特街上的唯美派。1881年4月，由吉尔伯特作词苏利文作曲的歌剧《佩兴斯》更为唯美派作了极其有效的宣传。剧中两位男性人物邦索恩和格罗斯夫纳的举手投足中都有惠斯勒、王尔德和诗人斯温伯恩的身影。剧中有歌词唱道：

在你中世纪的手中持一朵罂粟或百合，沿着皮卡迪利大街闲逛，  
你就算得上正宗唯美派的传道者，别管庸人们挤在一旁观望。

虽然王尔德对中世纪毫无好感，但当时去看《佩兴斯》的观众都把王尔德看作歌剧戏仿的人物之一。存心以服装和举动出风头（或“清除平庸”）的人最怕无人理睬，受到关注就算是达到了目

---

<sup>①</sup> 即 Richard Ellmann 的 *Oscar Wilde* (New York, 1988) 一书护封上所用的像片。



的。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歌剧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他们的歌剧里走一遭，几乎就等于得到举国一致的认可。《佩兴斯》这部社会讽刺剧的最大受益者是还没有任何文学成就可言的王尔德。王尔德后来在喜剧《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里塑造了一位伊林渥斯勋爵，这位贵族知道成功的诀窍：“温和是致命伤，……做过头最能成功。”看来王尔德当年在伦敦的街头是“做过头”了。

自助者天助。1881年9月，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歌剧制作人德奥里·卡特在纽约推出《佩兴斯》。据说是在萨拉·贝纳尔的建议下卡特电请王尔德到美国作商业性巡回演讲，希望他为英国的唯美主义现身说法，以便美国观众了解《佩兴斯》一剧的社会背景。卡特多年经营文化生意，他明白《佩兴斯》和王尔德的演说必定会两相促进。在王尔德接到邀请前，他的《诗集》已经问世（1881年6月），尽管评论界并不看重他的诗才，他总算有了诗人之名。这为美国方面做广告增添了一个有利因素。

王尔德在1881年的圣诞前夜登上邮轮“亚利桑那号”赴美，1882年元月2日，邮轮抵达纽约。据王尔德朋友、《双周评论》和《星期六评论》编辑弗兰克·哈里斯在《奥斯卡·王尔德：生平与忏悔》（纽约，1916）一书中记载，王尔德在过海关时轻浮地说，他需要申报的只有他的天才。急于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当然最关心他那唯美的服装：缎子卷边的深紫上衣配天蓝色领巾、齐膝短马裤加黑色丝袜，最显眼的莫过于长及足部的水獭皮镶边的绿色大氅（好一位惨绿少年！）。有趣的是王尔德那身打扮并非完全出于他本人的选择，在他与卡特的助手莫尔斯上校议定的合同

上，对着装有具体的规定。<sup>①</sup> 王尔德对指定他扮演的角色居然能胜任，实在是出人意料。唯美主义谴责丑恶的拜物教以及商业精神对文化的侵蚀，但王尔德本人却成了精心包装起来的商品。

王尔德的美洲之行历时整整一年。从新英格兰到加利福尼亚，从得克萨斯到魁北克，这位“正宗唯美派的传道者”马不停蹄地向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宣讲英国的文艺复兴和室内装潢。演讲的内容以当时英国标准来衡量并无新意，不过热情的掌声倒也间或可闻。概而言之，北美之行虽然获利不薄，从传播唯美主义的福音来说却是失败，王尔德不得不一次次应付尴尬场面。最大的收获是大西洋两岸报刊的追踪报道使他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王尔德还凭借一大摞事先准备好的名流（包括驻英公使、著名诗人洛威尔）介绍信结识了很多知名人士，包括诗界耆宿朗费罗和惠特曼，上门求见的也不乏其人，如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然而詹姆斯对王尔德一些“世界公民”式的言论深感厌恶，而且他不相信王尔德有什么真才实学。小说《悲剧女神》（1890）中的唯美派纳什很可能是詹姆斯以王尔德为蓝本摹写的。

惠斯勒后来曾指责王尔德剽窃，说他“在我与他的闲谈中拣些精华装点到外省去贩卖的布丁”。王尔德对此从未作正面回答。萧伯纳也在回忆王尔德的一封长信里提到，王尔德在绘画和音乐方面都是外行。<sup>②</sup> 由此可见，王尔德并不是到美国宣讲英国文艺复兴的合适人选。这或许更加说明，向美国听众表演伦敦唯美派的姿态是他的首要任务。

---

① Regenia Gagnier, *Idylls of the Marketplace: Oscar Wilde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 (Stanford, 1986), p. 56.

② Frank Harris, *The Life and Confessions of Oscar Wilde*, 2 vols (New York 1916), II, App., pp. 19-21.

## 二

王尔德要改变自己秀而不实的形象还需要好几年功夫。回到英国后，他那口吐珠玑的本领使他依然是伦敦餐桌上的霸主。1887年至1889年王尔德屈就《妇女世界》杂志编辑之职，此时的他已将主要精力投入散文体写作。佩特曾对他说，写文章、小说或戏剧实际上比写诗更难。1888年《快乐王子及其他童话》的出版标志了王尔德文学生涯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小说《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及其他故事》、《道连·葛雷的画像》、评论集《意图集》、童话集《石榴之家》以及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一个理想的丈夫》和《认真的重要》相继问世。王尔德的同时代人萧伯纳、哈代、叶芝和詹姆斯在英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比他更多的篇幅，但是他作为世纪末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称他执90年代喜剧界牛耳更是恰如其分。

但是，1895年的一次突发事件使还没有充分展露自己天才的王尔德身陷缧绁。王尔德长期来负才任气，有时好像故意要与社会习俗和流行的伦理观念作对，这恰恰是波德莱尔笔下“浪荡子”的崇高使命。1886年，结婚两年并已有孩子的王尔德在他年轻得多的罗伯特·罗斯的引导下误入同性恋地下世界。1891年，他又认识了还在牛津求学，比他小16岁的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道格拉斯对刚出版的《道连·葛雷的画像》爱不释手，于是就和作者两人色授魂与，陷入所谓的“不敢言明之爱”。<sup>①</sup>从此王尔德和道格拉斯仿佛是方外之人，毫无顾忌地结

---

<sup>①</sup> 引自 Alfred Douglas 作于 1892 年 9 月的《两种爱情》(Two Loves) 一诗最后一句。

伴旅游或一同出入伦敦的公共场所。道格拉斯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对两人的行为非常反感，但对从小就率性而为的道格拉斯毫无办法。1895年2月28日，亦即《认真的重要》在伦敦首演成功后两周，王尔德在俱乐部收到昆斯伯里侯爵留给他的名片，上面写道：“致奥斯卡·王尔德，装模作样的好男色者”。

王尔德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学作品对爱虚荣面子的维多利亚社会面般嘲弄，此时他却从所谓个人尊严的原则出发要求为他所鄙薄的社会提供法律保护。他毫不费力地以诽谤的罪名把昆斯伯里侯爵带到被告席上。两年后，他沉痛地承认，“我一生中最可耻、最无法原谅、最可鄙的事就是竟然不得不允许自己向社会求助，为的只是不受昆斯伯里侯爵的侵害。”

被告方要证实王尔德确系“好男色者”易如反掌。4月初，经开庭审讯，昆斯伯里侯爵无罪开释，而王尔德反因有伤风化的行为被捕。经过两次审问，伦敦的中央刑事法院根据1885年通过的一条针对男性同性恋的刑法修正案<sup>①</sup>判处王尔德两年徒刑。

王尔德在法庭上为自己与道格拉斯的关系作过一番表白，他力图表明，那是一种柏拉图式哲人与朝气蓬勃的年轻学生之间纯洁完美的感情，正是这种为俗世所不理解的高尚情操充溢于米开朗琪罗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字里行间（王尔德用想象笔法写过一篇讨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文章《W. H. 先生的画像》，提出莎士比亚所爱的是一位年轻男性演员）。这种辩白，与其说感人，不如说可怜。王尔德缺乏真正的勇气来面对一条条查有实据的指控。他和道格拉斯之间感情上的依恋绝对不是“忠贞”一词所能形容的，在猎取男色方面他们是友好的对手和搭档。他们和

---

<sup>①</sup> 当时没有“歧视”女性同性恋的刑法。维多利亚女王曾说，妇女之间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红楼梦》里以小恩小惠勾引玩弄贾家义学学童的纨绔子弟薛蟠可以说一模一样。受他们享用的变童面首大多社会地位低下，有的还是处于失业状态的仆佣。在王尔德和为他提供性服务的年轻男子之间处处是卡莱尔所说的“货币关系”（王尔德还数度被敲榨大笔款项）。伦敦高级旅馆厚厚的窗帷最终还是遮不住一桩桩丑事，王尔德的这些行止到头来只使得他的辩解乃至他一贯标榜的至高无上的美更显滑稽。<sup>①</sup>

当然，类似的嗜痂之癖在伦敦上流社会甚至内阁要员中绝非罕见。要说当时的社会是在一种伪善的道德观驱使下像猛虎扑食般抓住一位艺术家的过失不放则又是失公允了。当王尔德案的真相逐渐暴露后，物议沸腾。有关方面不得不予以追查，不然法官就要承担掩盖丑闻（该案还涉及当时首相罗斯伯里伯爵）的法律责任。矢在弦上，不得不发。

那么，为什么王尔德要打一场打不赢的官司以致引火烧身？为什么他要用遭他激烈批评的道德价值为最终诉求来证明他根本不存在的清白？也许王尔德太糊涂，也许一直就反抗父亲权威的道格拉斯在旁积极怂恿。不过王尔德一种微妙复杂的心理不能忽视。他年幼时就渴望在“女王诉讼王尔德”的官司中出场，他隐隐地有一种自毁的冲动，他逝世前不久给自己想好了永久的称号：“臭名昭著的牛津圣奥斯卡，诗人，殉道者”。

然而王尔德并不是一个真正随心所欲、蔑弃礼法的人。他的道德感使他一直对自己身上邪恶堕落的一面有所意识，但是他的唯美主义的思想又几乎是与他对罪恶的兴趣同步发展的。《道连·葛雷的画像》中葛雷的教唆犯沃登勋爵说，“抵制诱惑的最好办法就是向它屈服”。王尔德的“屈服”之路说来话长。

---

<sup>①</sup> 关于王尔德案可参看 H. Montgomery Hyde 的一系列著作。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文化中某些成分唤醒了王尔德心灵深处的潜质。1884年5月29日王尔德与康斯坦丝·劳埃德结婚，然后南下法国度蜜月。一年前，他就在巴黎盘桓数月，与华兹华斯的曾外孙罗伯特·谢拉德结为契友，还拜谒了雨果等文人，并很快对颓废派文学以及左拉作品中那类有关病理和变态的描写产生亲近感。法国文学中的颓废观起于1830年代，随着令人生厌的资产阶级的兴起，让资产阶级或墨守陈规的市民惊愕也成了有些作家的游戏（即多少有点粗俗的“épater le bourgeois”的心态）。王尔德新婚燕尔之际正值于斯曼（1848—1907）的《逆反》发表，这部小说把法国颓废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小说主人公德艾森特醉心于波德莱尔、马拉美和魏尔仑的作品，醉心于种种怪诞反常的情致。他对社会的反抗是一种德·萨德侯爵式的反抗，真正的敌人是任何社会中都必然存在的人间法规。德艾森特将文明的本质对立于是现实生活和自然，这不难使人联想到王尔德（还不如说惠斯勒）的艺术观。

《逆反》在王尔德身上引起的回声是巨大的。在《道连·葛雷的画像》第十章，沃登勋爵捎给葛雷一部“黄封面的书”，这部无名奇书其实就是《逆反》。葛雷为它所深深打动，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王尔德本人的经历。王尔德通过葛雷的印象来描述小说中那位年轻的巴黎贵族：

他既能玩味被人们荒唐地称作德行、实为矫情的自我克制，同样也能欣赏被贤哲们称作罪恶的天性反抗。这份心理变态者的自供弥满了弥漫的薰香，葛雷为之心神不安：仿佛整个世界的罪恶都穿过了精美的衣服，在柔美的笛声伴奏下在他面前一一走过。

假如说《道连·葛雷的画像》里还有一种叙事上的多重性来冲淡甚至抵消罪恶的魅力，作于1889年的《笔杆子、画笔和毒药》<sup>①</sup>一文里对“壮美的犯罪”和“细腻的作恶”的欣赏口吻确实是不加掩饰。这篇文章是托马斯·格里菲斯·威恩莱特（1794—1852）的小传。威恩莱特是兰姆的朋友，曾为《伦敦杂志》撰写艺术专评，他的绘画也曾在皇家艺术院展出，后因挥霍无度入不敷出，走上犯罪之路。为了攫取钱财，他数次以马钱子碱（土的宁）夺人性命。事发后他被放逐到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客死他乡。王尔德对威恩莱特设毒的方法失传表示惋惜，他甚至说，假如威恩莱特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罗马帝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或十七世纪的西班牙，人们就会中肯地评价他。王尔德钦佩威恩莱特的聪明才智，把他所谓出色的人格归功于罪恶的锻炼。和十九世纪有的法国作家一样，王尔德相信，当代社会的画板太灰黯了，鲜艳的罪恶才能丰富它的色彩；个人主义的骄傲只有通过被社会谴责的行为才能达到极致。他故意不顾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引述路德的格言“勇敢地犯罪吧”（*pecca fortiter*）；他甚至戏言，他有点像尼禄——只需改换一下发式。

杰出的批评家燕卜逊在评论约翰·盖伊（1685—1732）的《乞丐的歌剧》时指出：“拜伦主义差不多就是有意识地把诗人视为麦基斯〔该剧中强盗〕。我们不必追随从波德莱尔到王尔德的传统；按照这一传统，艺术家犯罪是必然的命运，仅仅因为他伟大；胆敢傲睨神明无非就是承认自己是悲剧性的英雄人物。如果艺术家一味这样做，那么这古老的戏剧主题就变成了一种讨厌的

---

<sup>①</sup> 该文副题为“绿色研究”（*A Study in Green*）。王尔德说，“对绿色之爱在个人表明精细的艺术气质，在民族可能表明一种漫不经心的精神，甚至是道德风气的颓废。”绿色是爱尔兰的民族之色。

东西。”<sup>①</sup>燕卜逊这些人木三分的文字不仅刻画了“从波德莱尔到王尔德的传统”，还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前几年发生在国内的一场争论。有的论者为顾城杀妻辩解时搬出艺术独立于伦理的说法，好像诗人不必遵守为常人所设的法律。一位还有待证明自己不是徒有诗人之名的流浪者要借“从波德莱尔到王尔德的传统”来抬高自己未免太可怜了。

如果王尔德在创作中唯变态心理与邪淫是求，托尔斯泰对他的评价（“否定道德，赞美腐化”）<sup>②</sup>就不会引起很多异议。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道连·葛雷的画像》。

这部作品在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中不能归入杰作之列，但它却因体现了英国唯美主义运动和王尔德人生经历中的内在矛盾而具有特殊意义。小说里的沃登勋爵粗看之下是长于发表怪论的王尔德的翻版。他发挥奇想时“既像演杂耍，又像变戏法，刚刚让它滑过去，随即又把它抓回来；忽而用想象的虹彩把它点缀得五色缤纷，忽而给它插上悖论的翅膀任其翱翔”。但是，在诱惑下走向堕落和罪恶的葛雷很可能是王尔德真正的自我写照，小说初稿中甚至他的年龄也与作者一样。可以说，王尔德有意无意地通过葛雷的蜕化过程为自己提供一个自省自察的窗口。小说有一个浮士德式的主题的变奏——葛雷为了青春和享乐出卖灵魂。面对朋友霍尔渥德为他画的全身肖像，葛雷说，“如果我能够永远年轻，而让这幅画像去变老，要什么我都给！……我愿意拿我的灵魂去交换！”葛雷在罪恶的路上越走越远，自己的脸上留住了青春的美色，画像却变老变丑，慢慢地不堪入目。画像不断向葛雷揭示他的恶行，葛雷惊慌中持刀向它刺去，不料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

① William Empson, *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 1935, Hogarth edition (London, 1986), p.208.

② *What is Art?* 1898, tr.by Aylmer Maude (New York, 1962), p.258.



当人们破门而入时发现，躺在地上的葛雷形容枯槁，面目可憎，墙上的画像依然容光焕发，洋溢着罕见的美。在现实生活里的道德与美的冲突中，最终占上风的还是前者。感官享受的表面绚丽之美掩盖不了内在精神的腐败。葛雷的遭遇说明他是唯美主义的牺牲品，而不是唯美主义的殉道者。正如巴尔扎克的创作实践违背了他的主观愿望，坚持艺术应与生活无关的王尔德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创作了这部小说。雷纳·韦勒克认为《道连·葛雷的画像》“展现了一幅道德败坏遂遭惩罚的寓意画而非一篇为审美生活而作的辩护”<sup>①</sup>。

虽然《道连·葛雷的画像》在出版后被认为不道德（王尔德序言里有的语句为批评者提供了炮弹），现在读来，小说中的道德寓意是大致清晰的。王尔德在盘弄唯美主义的恶之花时又对它投去深表怀疑的一瞥，他的双重立场赋予作品一种内在的张力。霍尔布鲁克·杰克逊早在1913年就注意到，在王尔德一生中的任何阶段，他从来没有彻底不顾道德。“他作品中总是有那么一种细微的声音，它终于冲破障碍，在《从深处》一书中发为穿云裂石之声”<sup>②</sup>。

### 三

王尔德说过，他一生中有两个转折点，一是上牛津，二是下监狱。1897年年年初，他的刑期大半已过，在雷丁监狱的长官奈尔逊的许可下，他给道格拉斯写了一封长信，回顾两人的交往过程和他在狱中铭心刻骨的感受。这封当时并未立即发出的信由王

---

<sup>①</sup> 《近代文学批评史》，杨自伍译，第四卷（上海，1997），第48页。艾尔曼在王尔德传记的《否定道连》一章中有类似的结论。

<sup>②</sup> Holbrook Jackson, *The Eighteen Nineties*, 1913, Pelican Books (Harmondsworth, 1939), p.80.